

生态翻译学理论 应用研究

◎岳中生 / 著

译外借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本书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生态翻译批评研究”（项目编号：2014BYY029）研究成果。

生态翻译学理论 应用研究

◎岳中生 / 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 北京 ·

内 容 提 要

本书在对国内翻译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生态翻译学的思想进行梳理和总结,通过这种方式对生态学和翻译研究做了全面的概览性的总结,进而以生态翻译学的应用发展为主线,重点梳理生态翻译学在公示语翻译、商务翻译和文学翻译实践中指导与应用,从而进一步解读生态翻译学的主张与优势。

本书适合翻译人员阅读、学习,也可供相关爱好者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翻译学理论应用研究 / 岳中生著. -- 北京 :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8.7

ISBN 978 - 7 - 5170 - 6571 - 5

I. ①生… II. ①岳… III. ①翻译学 - 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40562 号

责任编辑:陈 洁 封面设计:王 伟

书 名	生态翻译学理论应用研究 SHENGTAI FANYIXUE LILUN YINGYONG YANJIU
作 者	岳中生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 号 D 座 100038) 网址:www.waterpub.com.cn E-mail:mchannel@263.net(万水) sales@waterpub.com.cn 电话:(010)68367658(营销中心)、82562819(万水)
经 售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
排 版	北京万水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40mm 16 开本 15 印张 21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2000 册
定 价	60.00 元

凡购买我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的,本社营销中心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空间内生物与环境构成的自然、开放的生态学基本单位，在生态系统中各种生命现象之间在生存过程中相互竞争、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形成健康有序的状态。每个生物单位都处于一定的生态位下，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通过“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等方式，实现生态系统的自我控制、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实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这些重要的生态学概念被广泛运用于生态研究和交叉学科领域，包括翻译学研究。华夏几千年的文化思想中也不乏经典生态智慧，以“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为本”“整体综合”为特征的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哲理。中国的传统生态思想注重“和谐”，认为“和谐”是“天和”和“人和”及“心和”的总和，是主客关系的有效性协调。生态思想的特点具有整体性、多层性、动态性、互动性、处境性和圆融性，这种学科的思想给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带来了新的启示。

生态翻译学是翻译学和生态学的联姻，提倡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翻译，解读翻译过程。翻译的实质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如何通过翻译中文化的生态平衡来实现文化的多样性，以达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翻译界学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翻译的存在离不开周围的环境，翻译同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关系密切。翻译活动的开展处于地球的整个生物圈中，需要社会基础，也需要生物基础。翻译的发展离不开翻译的生态环境，两者之间存在协同进化的关系。翻译的生态环境包括对翻译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节作用的多维空间和多元环境系统。

笔者结合多年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经验，借鉴了国内有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成果及其经验，就生态翻译学理论应用研究做了详细地阐述。具体来说，本书共六章：第一章为现代翻译理论，简要阐述了有关翻

译理论的建构及发展和译者素质；第二章为生态翻译学理论综观，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的起源与发展、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体系及核心术语体系，从宏观和中观层面介绍了生态翻译学；第三章为生态翻译学与公示语翻译研究；第四章为生态翻译学与商务英语翻译研究；第五章从生态翻译学与文学翻译研究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生态学基本原理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从诗歌和新闻两种文学体裁来探讨生态翻译学视角的文学翻译实践；第六章为生态翻译学与翻译批评研究。

作者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借鉴了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恳请学界同行以及广大读者斧正！

作者

2018年5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现代翻译理论	1
第一节 翻译理论	1
第二节 翻译的内涵及意义	17
第三节 译者的素质与准备工作	23
第二章 生态翻译学理论综观	30
第一节 生态翻译学的起源与发展	30
第二节 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	51
第三节 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	72
第四节 生态翻译学核心术语体系	87
第三章 生态翻译学与公示语翻译研究	89
第一节 公示语翻译研究	89
第二节 公示语生态翻译实践	99
第四章 生态翻译学与商务英语翻译研究	104
第一节 商务英语语言的定性分析	104
第二节 商务英语翻译理论研究	124
第三节 商务英语翻译生态建构	131
第四节 商务英语生态翻译实践	135

第五章 生态翻译学与文学翻译研究	156
第一节 文学翻译的理论考量	156
第二节 生态学基本原理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	177
第三节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实践	187
第六章 生态翻译学与翻译批评研究	205
第一节 生态翻译学理论批评	205
第二节 生态翻译批评体系	211
第三节 生态翻译批评实践	214
参考文献	229

第一章 现代翻译理论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翻译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伴随着翻译活动的日益频繁，翻译理论也日渐丰富。当前的翻译理论主要包括：翻译基本原理、翻译史、翻译思想、翻译原理、翻译批评等。

第一节 翻译理论

从“翻译”的定义来看，翻译即为言语的转换，使读者能够理解。《新华字典》解释为：用一种语文的内容形式依照原来的意义改变成另一种语文的形式；《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通过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来转化成另一种语言文字并将其意义表达出来。翻译所要表达的基本含义有两个：一是翻译是以忠实于原作的意义和目的来进行的活动；二是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相互转换的活动。

一、翻译理论研究概述

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大致从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中国的翻译理论发展概况和近代西方翻译理论发展概况。

（一）中国翻译理论发展概况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末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

东汉末年从月氏国来华的著名僧人支谦，是中国第一个探讨翻译理论和方法的人。他的《法句经序》是我国第一篇论及翻译的文献，

涉及翻译原则，先要求“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再要求“因循本旨”，“实且径达”，主张译经“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据钱钟书考证，严复的“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道安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五失本是：①梵文倒置，译时须改从汉文法；②梵经质朴，汉文华丽，为了接受，不得不略加润饰；③梵经同一意义，反复多次，不得不删削；④梵经结束时，要重述一遍，译时删去；⑤梵文说完某事，重述后再说其他，译时删掉重复。“三不易”指的是：①用当时的骈文译古代梵文，难得恰当；②古人的精微哲理，后人难以会通；③后人以今度古，任意揣测，随意翻译，难得正确。

鸠摩罗什在道安的理论基础上创立了意译派，是守国第一个全面主张意译的，主张：翻译不违原文本意，但对原文形式不必复制，只要能存其本，就不妨“依实出华”。

玄奘反对鸠摩罗什的意译方法，改用直译兼意译的方法，以信为本，兼顾其他，确切表达佛经的原意，用近乎白话的文体译经，他提出翻译标准后人归纳为“既须求直，又须合俗”，实为后世信达之先驱。此外，他还制定了音译的“五不翻”原则：佛经密语要音译；佛典的多义词要音译；无相应概念的词要音译；沿用约定的古译；为避免语义失真用音译。

两汉至明初翻译有“三多三少”的特点：独立翻译的多，合作翻译的少；外译中的多，中译外的少；编译译述的多，全文翻译的少。

1629年，明朝徐光启受命创设历局修历，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科学翻译机构，结束了此前无组织的个人翻译阶段，徐光启与李之藻、李天经及一些耶稣会士共同编译了西方天文学的历书图表等。

清末林则徐组织编译《澳门日报》，组织摘译《反鸦片论》，组织翻译国际法书籍，组织编译《四洲志》。1984年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其绝大部分的内容来自编译材料。

19世纪初，传教士也在中国创办翻译机构，如“墨海书馆”，这是外国传教士在我国创办最早、影响较大的翻译出版机构，设于1843年。

出于外交的需要，清末创立了为清朝政府培养外交翻译官员的同文馆。出于洋务的需要，清朝政府还为近代军工产业配备了相应的翻译出版机构，其中最有名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著名的科学翻译家徐寿和华衡芳是制造局翻译馆的倡议者和创建者，该馆聘请过不少外籍翻译家。另一个较大的翻译机构是江楚编译局，建于1901年，设于武昌，张之洞主其局务。1896年，清朝礼部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中，将翻译人才培养课程分为六科：经学、史学、舆地学、掌故、算学和译学。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以后，同文馆并入大学堂，一度易名为翻译科，后定名为“译学馆”。

清朝末年，中国的外交官员、政府派赴国外考察和游历的官员以及自费出国考察人员和应邀外访学者，均曾奉命和主动收集并翻译一些国外有关的书刊资料。同时，清朝政府开始向国外派送留学生，许多人回国后成为中外翻译的主力军。如严复1876年受派赴英留学，学习军事，但他在国外兼修西方哲学、社会学、进化论、法律、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回国后为中国译介了大量的国外社会科学文献。译论方面，严复将变通的艺术用以至极，成了变译集大成者。

1897年梁启超撰《论译书》，指出译书的“二蔽”：“徇华文而矢西义”“徇西文而梗华读”。并提出对策：“凡译书者，将使人深知其意。苟其意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要求译者“条分缕析，庶易晚畅，省读者心力”。

民国时期，留学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学生纷纷回国，他们都是兼通中文、外文和科学知识的最佳译才，如杨杏佛、王普、马君武、周建人、张资平、王国维、鲁迅、王云五、丁西林、郑振铎等。其中不少人自发创立了早期的科学社团，几乎都把翻译外国科学书籍、统一译名及编纂学科词典作为活动内容之一。而留学法、德、苏人员中不少人译介了大量的马列著作，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如王一飞、乌兰夫、刘仁静、任弼时、沈雁冰、李大钊、李达、李介三、张闻天、柳直荀、翟秋白、恽代英等一大批知名人士。民国政府设立了正规的图书编译机构，从20世纪20年代起教育部和大学院筹备并附设了国立编译馆，成为当时中国编译活动的主力军。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开始为了外交做出努力。1940年，在延安开办外语学校，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开始着手培养大批的外交人才和翻译人才。解放战争时期，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在华北解放区成立外事学校，并将外事学校和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合并为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共产党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均有自己的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及其他科学著作。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我国又出现了一次翻译高潮，这次翻译高潮为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提供了契机。这次翻译高潮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范围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对我国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决定了这次翻译高潮最突出的特点是：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广泛、题材体裁更丰富、理论研究更活跃。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以外文译中文为主，而这一次将逐渐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从而也对所有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二）近代西方翻译理论发展概况

1. 西方翻译简史

公元前约3000年，古代亚述帝国出现了正式的文字翻译，译员把国王的法令、宗旨翻译给庶民。公元前3世纪末至1世纪初，是希腊和古代欧洲科学史的黄金时代，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科学文化中心大量吸收了东方的文化遗产。公元1世纪，罗马大量翻译希腊化时期的各种著作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较大规模的翻译活动。9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统治者专门设立了“智慧之馆”，鼓励阿拉伯学者直接翻译古希腊典籍及印度的科学著作，吸收小国科技精华，这是继盛唐佛经译场之后世界上最大的翻译机构，形成了中古时期世界翻译史上的又一个高潮。中古后期，《圣经》于14世纪首先译成英语，15世纪译成德语，后来译成其他欧洲语言，对欧洲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世纪的翻译主要为宗教势力把持，翻译思想受到禁锢。文艺复兴时期，翻译活动大增，译论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20世纪前后，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

变, 20 世纪成了信息时代, 也成了翻译世纪。1945 年联合国成立, 英、法、中、俄、西、阿六种语言为联合国工作语言, 在此聚集了成千上万名翻译工作者, 联合国可谓是“翻译之家”。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 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 世界范围内科技译文的数量就增加了 4.5 倍, 80 年代初为欧共体各机构工作的译员近 2000 人。在信息爆炸时代, 各国都组织了大规模的翻译活动, 国力的竞争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信息获取与利用的竞争。

语言方面, 从希腊语分化出来的古希腊文产生了罗马文, 即古代拉丁语。18 世纪以前, 欧洲外交普遍使用拉丁文, 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时也是使用拉丁文。随着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中世纪后半叶原来各地使用的拉丁口语均与地方言结合, 形成了正式的法语、意语、西语和葡语。从东希腊文脱胎出来的拜占庭文字, 后来则分化成英语、德语、俄语等。“二战”后英语在外交上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几乎全世界通用。但在正式外交事务和谈判中, 各国仍然使用本国语言, 因此, 翻译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2. 西方译论发展

译论方面, 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公元前 1 世纪的古罗马人西塞罗。他说: “我所注意的并不是字当句对, 而是保留语言的风格和力量”。他主张翻译不应拘泥于原文词语, 而应注重原文的思想, 坚持不可逐字死译而要符合译文的语言规则与特性; 其后, 奥古斯丁提出翻译要注重读者; 第一个系统阐述翻译理论的法国学者艾蒂安·多莱, 则提出了翻译五原则: 理解原著内容, 通晓原语和译语, 避免逐字对译, 采用通俗形式, 讲求整体效应。

18 世纪是西方翻译理论的重要发展时期, 其中最具时代成就的有英国的坎贝尔和泰特勒。坎贝尔认为好翻译有三条原则: 正确传达原意、遵守译语特点的同时尽量传达原作的风格、译文如原文自然易懂; 泰特勒发表《论翻译的原则》一文, 主要论述世界作品的翻译, 也提出翻译三原则: 译作应完整地再现原作内容、译作风格应与原作相同、译作应如原作自然流畅。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被认为是西方翻译史上第一篇较为完善的翻译理论文章。

而译学的奠基之作是1953年苏联语言学家、翻译学家费道罗夫的《翻译理论概要》，这是当代第一部专论翻译科学的理论性著作，首次阐明了可译性与确切性原则。

20世纪60年代最有影响的译论著作有1964年法国乔治·穆南的《翻译理论问题》和1965年英国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前者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分析了翻译的语言障碍，揭示了与翻译活动密切相关的词汇结构化、句法和语境、语言符号的蕴涵意义、言语交际行为、语言与人类文化的共性问题，对可译性理论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述；后者从语言学和概率论角度，首次从系统功能语法角度，围绕“对等”概念，探讨了翻译的性质、类型、方法、条件和限度等问题，并运用层次、范畴以及阶级等语言学概念来论述语际转换的根据。其认为翻译实践的核心问题是寻找对等成分，对行文对等与形式对应、形式关系与上下文关系、翻译的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以及语言与文化的可译限度等作了深入分析，所提出的翻译的语言综合情境模式以翻译的所指功能或叙事功能为出发点，注重双语的同义替换与逻辑联系，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运用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途径。

1964年和1969年美国翻译学家奈达先后出版了两部代表性著作《翻译科学探索》和《翻译理论与实践》，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出发，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试图建立最有效、最科学的三阶段翻译转换模式：①将原语句子简化为意义最清楚的核心句；②翻译核心句；③将译语核心句转换成译语表层句子。他明确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观，其核心是认为翻译应是“最接近原文的、自然的信息对等”，后来又修订为“功能对等”，并肯定这种对等必须以读者反应为据，其翻译风格的选用主要取决于读者的要求。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西方译界形成了多个主要的翻译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其中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英国人巴斯奈特和比利时人勒弗维，1990年他们合编了《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提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口号，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

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指出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译语文化中起到原文在原语文化中同样的功能。而“解构”学派，则认为文本意义并不确定，不存在“核心”或“深层结构”，极力提倡异化翻译，认为这是对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抵制；“后殖民主义”学派则呼吁后殖民地的人民要正视“翻译话语权”问题的严重性，认为传统翻译学关于对原作忠实观点阻碍了翻译理论去思考译本的力量。

二、翻译学的发展历史

翻译活动与社会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能促进各国的文化交流，加快历史的进程，推动民族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因此，翻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翻译学早期历史

有关翻译的记述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翻译实践在文化与宗教的文本和概念的早期传播中起了关键作用。在西方，多位学者曾就翻译方法问题展开讨论，其中包括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和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拉丁语：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1世纪），以及圣哲罗姆（St. Jerome）（4世纪）。他们的思想直到20世纪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以圣哲罗姆为例，他将《圣经》的《七十子希腊译本》译成拉丁语，影响了后世《圣经》的翻译。事实上，在西欧，前后1000多年，特别是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圣经翻译一直是不同意识形态冲突的战场。在中国，佛经的翻译从1世纪起就揭开了此后多年关于翻译实践的讨论。

虽然翻译实践历史悠久，但翻译研究到20世纪后半叶才发展成一门学科，在此之前，翻译往往仅被视作语言学习的一部分。确切地说，自18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及后来，许多国家中学的语言学习一直沿用所谓的语法翻译法（Cook 2010:9-15）。这种方法起初用于学习古典拉丁语，后来用于现代外语的学习，强调对语法规则和句型结构的

死记硬背，再通过翻译句子来练习和测试。这些句子通常是专门设计的，仅用来体现所学的语言结构，彼此间毫无关联。这种方法至今仍在一些语境中使用，下面这些英语句子翻译练习可谓典型。所有句子都非常奇怪，完全脱离语境，而目的是为了练习西班牙语时态的用法。这些句子摘自 K·梅森 (K. Mason) 编著的《高级西班牙语教程》(*Advanced Spanish Course*)，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这本教材仍然在英国一些中学使用：

(1) The castle stood out against the cloudless sky.

(城堡矗立在不云的天空下。)

(2) The peasants enjoyed their weekly visits to the manet.

(农民很喜欢每周赶集。)

(3) She usually dusted the bedrooms after breakfast.

(她通常吃过早餐后打扫卧室。)

(4) Mrs Evans taught French at the local grammar school.

(艾文斯太太在当地文法学校教法语。)

翻译与语言教学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学术界轻视翻译。翻译练习被视作学习新语言的途径，或者作为，在尚未能阅读原文之前阅读外语文本的方法。故此，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在一些讲英语的国家，随着直接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的兴起，语法翻译法越来越遭人诟病。交际教学法强调学生学习语言的本能，努力在课堂复制“真实”的语言学习环境。该方法往往更侧重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而非笔头表达能力，至少教学早期如此。而且一般避免使用学生的母语，结果语言学习完全抛弃了翻译。自此，就教学而言，翻译更多地局限于高级和大学语言课程，或者专业的翻译培训，只是到近年来才在语言教学中重新使用翻译。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自爱荷华和普林斯顿开始，翻译工作坊的概念促进了文学翻译。这一概念源自 20 世纪 20 年代剑桥文学评论家艾弗·阿姆斯壮·理查兹 (I. A. Richards) 举办的阅读和实用批评工作坊，以及后来的创意写作工作坊。翻译工作坊主要为了向目标语文化引进新的译作，并对翻译过程中以及解读文本时的一些细致原则

展开讨论。^① 同样促进文学翻译的还有比较文学，对文学进行跨国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当然也就需要研读一些翻译作品。

翻译也是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该学科主要针对两种语言进行对比，试图找出两者间的一般和特殊差异。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对比语言学在美国发展成为系统的研究领域，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其鼎盛时期。翻译作品及翻译实例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这种对比的方法虽然没有融合社会文化和语用元素，也没有充分吸收翻译作为交际行为的思想，但它对一些重要的语言学翻译研究，如维奈 (Vinay) 和达贝尔内 (Darbelnet) 及卡特福德 (Catford) 的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长期以来，翻译学研究一直沿用语言学研究模式本身就表明语言学与翻译之间显然存在着固有的联系。在所采取的具体模式中，有生成语法、功能语言学以及语用学。

更具系统性的语言学方法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出现，其中一些研究如今已经成为经典，例如：

维奈和达贝尔内合作出版了《法英比较文体学》(*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anglais*)，对英语和法语进行对比，首次提出用于描述翻译的一些关键性术语。这部著作 1995 年才译成英语。

阿尔弗雷德·马尔布朗 (Alfred Malblanc) 针对英语和德语翻译做了同样的研究。

乔治·穆南 (George Mounin) 出版的《翻译的理论问题》(*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 探讨了翻译的语言学问题。

尤金·A·奈达 (Eugene A. Nida) 吸收了乔姆斯基当年非常时髦的生成语法，作为其著作的理论基础。他的这些著作最初是作为指导圣经译者的翻译指南。这种更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始标示出翻译的“科学”研究领域。奈达 1964 年出版的专著《翻译的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在书名中使用了“科学”这个词。相对应地，在德语中，萨尔布吕肯的萨尔兰大学的沃尔弗拉姆·威尔斯 (Wolfram Wilss) 在教学和科研中也使用了翻译科学

① 关于这一背景知识更深入地讨论，见 Gentzler (2001: Chapter 2)。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这个概念。另外,海德堡的温拿·科勒(Werner Koller)、奥托·凯德(Otto Katie)和阿尔布特·纽伯特(Albert Neubert)等非常活跃的莱比锡学派学者都采用了这个词。当时,这个刚刚出现的学科名称尚未确定,也有学者建议用其他名称,如 *lltranslatology*, 以及该词的德语对应词 *Translatologie*, 法语对应词 *traductologie*, 西班牙语对应词 *traductologia*。

(二) 霍姆斯、图里的“翻译学结构图”

翻译学在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过程中,詹姆斯·霍姆斯的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影响深远(Holmes 1988b/2004)。据根茨勒在其专著《当代翻译理论》中描述,“大家普遍认为霍姆斯的论文是该学科的奠基之作”。玛丽·斯内尔·霍恩比也持相同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所述,该学科多由其他学科演变而来,霍姆斯最终出版的论文却是其1972年会议演讲稿的扩充版,其正是在哥本哈根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翻译分会场发表的演讲。霍姆斯指出了当时这个学科所面临的局限,因为当时的翻译研究全部散见于一些更古老的学科(语言、语言学等),没有自己的“家”。他还强调要建立“其他的沟通渠道,冲破学科壁垒,将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组织起来,不论他们是什么背景”。

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霍姆斯提出了一个整体框架,描绘了翻译学的范围,而这个框架后来由以色列著名翻译学者图里(Gideon Toury)用图1-1呈现出来。

霍姆斯对这个框架作了如下解释,纯理论翻译学的目标是:①描述翻译现象;②确立普遍原则,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翻译理论)。“理论研究”分支又分为普遍理论及专门理论,根据霍姆斯的说法,“普遍理论”是指试图描述或解释各种翻译活动,并且归纳出适用于所有翻译的理论。“专门理论”的适用性则取决于媒介、文本类型等。

(1) 产品导向研究,考察现成的翻译作品。可以对单一原文单一译文文本进行描述或分析,也可以对同一原文的多个(同一语言或不同语言)译文进行比较分析。这种小型研究可以累积成大量的翻译分